

语言适应研究五十年：语言发展与社会语境的适应

李娅楠，卿雪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4日

摘要

语言适应理论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探讨的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如何通过调整自身的语言行为来适应交际对象、场景。本文梳理了该理论的发展脉络、核心概念跟应用领域，讨论被引入中国后做了何种研究，取得了何种成就。本文探究了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多立足于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教育等领域，从中可知语言适应在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中的复杂过程。文章最后指出语言适应理论在中国语境下进行的方法论创新与研究视角上面临的困境，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进行展望。

关键词

语言适应，言语适应，交际策略，社会语言学

Fifty Years of Language Accommodation Research: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daptation to Social Contexts

Yanan Li, Xuehua 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June 2,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anguage accommodation originated in the 1970s, primarily exploring how individuals adjust their own language behaviors to adapt to interlocutors and context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core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the theory, and discusses the research conducted and achievements made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It

explores that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findings are mostly based on domains such a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population mobility, minority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vealing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language accommodation i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finally points out the dilemmas faced i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regarding language accommodation theory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offers prospect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Keywords

Language Accommodation, Speech Accommoda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Sociolinguis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类社会的交往本质上就是在一起商议的过程,而语言就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工具,但说话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交际对象、场合及目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因为要与外人相处而调整自身语言行为以适应当前交际情境的现象,就是言语适应(Speech Accommodation)。20世纪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霍华德·贾尔斯(Howard Giles)和他的团队率先系统的提出言语适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 SAT),开启了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先河。该理论最初聚焦于语音层面的趋同与趋异,意在解释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原因。之后的几十年中,言语适应理论不再只属于社会心理学,也吸收了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加速了人口流动,多语多言的现象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使得言语适应问题变得更实际也更复杂。在中国背景语境下,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并行,外语教育越来越普及。这一独特的语言情况为言语适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内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引进该理论以来,多倾向于把“言语适应”称之为“语言适应”,且将“语言适应理论”广泛应用于流动人口市民化、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留学生跨文化交际以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社会化等领域。本文主要在于理清楚语言适应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在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回顾国内研究的现状与成果,剖析现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展望。

为客观地把握语言适应研究的主题分布与演进脉络,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语言适应”“言语适应”“交际适应”等为主题词,检索了近十年间发表的英文学术论文,经人工去重和筛选后获得有效文献232篇。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见图1。

网络包含281个节点、410条连线(密度0.0104),反映出该领域研究主题较为分散,核心聚类尚不稳固。从高频关键词看,“语言适应”与“文化适应”“二语习得”“城市化”等关联紧密,且近年来“跨文化交际”“身份认同”等节点逐渐凸显,显示研究焦点正从微观的语言方向向宏观社会适应去延伸。这一计量结果直观呈现了国内研究的整体格局,也为下文分领域梳理实证文献提供了参照。

2. 语言适应理论的发展与演进

言语适应理论自被提出以来,其中的理论内涵与研究边界不断地被拓展,尤其是心理层面的解释不断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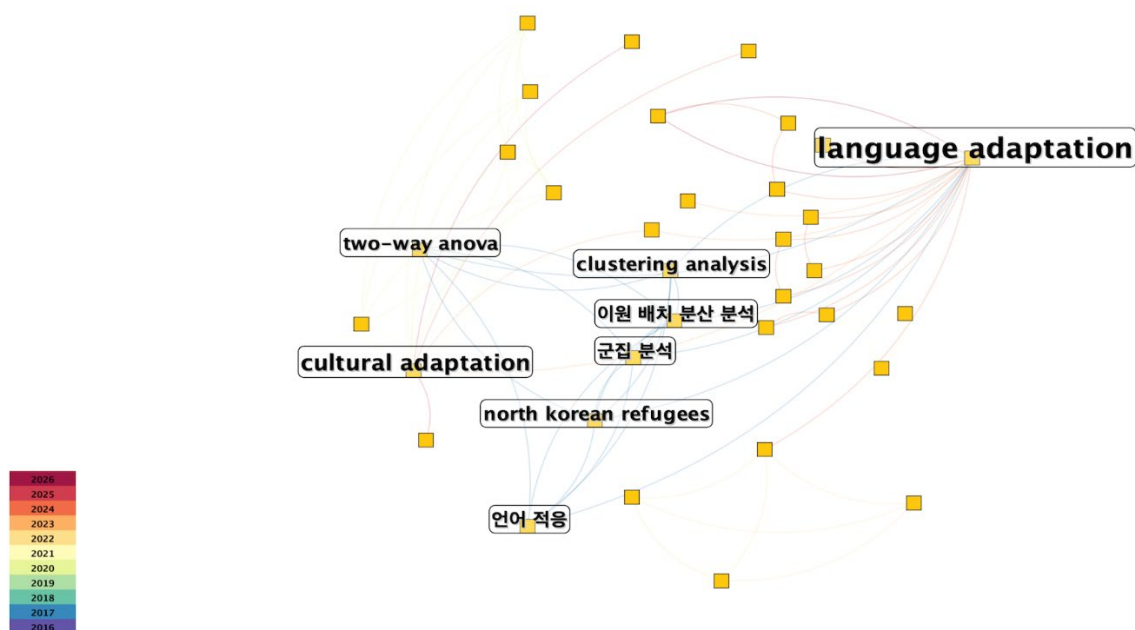


Figure 1. Co-occurrence graph of language adaptation keyword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图 1. 近十年语言适应关键词共现图谱

2.1. 理论提出与早期心理学研究

言语适应理论的提出,来自社会心理学关于群体间关系和社会认同的研究传统。贾尔斯(Howard Giles)等人通过观察双语和多方言社群的交际行为发现,说话者会故意调整自己的口音、语速甚至语种。他们认为:言语适应本质上是一种用来控制交际者之间社会距离的方式。该时期的理论主要区分了两种核心策略即趋同与趋异。

(1) 趋同(Convergence):是说话者调整自身言语使其向对方靠拢,表示亲和、尊重与合作意愿。(2) 趋异(Divergence):是说话者特意强化自身固有的语言特征以拉开与对方的距离,通常用来表达群体忠诚、维护社会边界或抗拒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类型学上,除“趋同”与“趋异”外,后续研究补充了维持策略(Maintenance)也就是说说话者在面对趋同或趋异压力时,刻意保持自身语言特征不变,这同样传递着特定的社会结构信息。

根据适应的方向与维度,研究者进一步划分了以下两类:

① 向上适应与向下适应:前者指向社会声望较高的标准变体靠拢;后者则指向声望较低但具社区亲和力的非标准变体(如方言)靠拢。② 情境适应与长期适应:情境适应是特定交际情境下的临时性语体调整;而长期适应则是持续的、内化的语言行为重塑。所以也可以说长期的情境适应往往是导致个体或群体语言转用的一个前期条件。

2.2. 从“言语”到“语言”

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适应行为远不止存在于语音层面。刘正光在引介该理论时指出[1],适应行为已全面扩展至词汇选择、句法结构、语体风格、语用策略乃至非言语行为(如手势、目光接触)。因此,学界逐渐倾向于使用包容性更强的“语言适应(Language Accommodation)”或“交际适应(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这一转变标志着研究重心从“如何说(语音)”延伸到“说什么(内容)”和“为何这样说(语用)”这些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

2.3. 复杂系统视角与哲学反思的加入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尝试将语言适应置于更大的理论范围里审视。姜晖、王强与王士元从演化语言学与复杂适应系统(CAS)的理论出发,提出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由无数使用者在交际场景中自由选择且共同塑造的复杂适应系统[2][3]。无数个体的言语适应行为不断累积,在整体上看可能最终导致语言结构的变化与语言生态的变动。

同时,有学者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反思。罗迪江提出的“语言适应论的生成观”[4],认为适应不是机械的“刺激”与“反应”过程,而是说话者在与环境互动中不断去创造出一个新意义的过程。兰晶、罗迪江进一步指出,当代语言适应研究的解释范式有了后现代的特点[5],就是摒弃单一的因果决定论,转而关注多元、流动且情境化的过程。

3. 语言适应的影响因素

语言适应行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处于特定时空下的交际者,在心理需要、社会结构与即时语境这些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做出的有意或无意识的选择。

3.1. 社会心理层面

社会心理因素是驱动言语适应的内部力量。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趋同?主要是因为想跟对方处好关系,这样子的趋同行为就是“亲和动机”,就是通过语言上的靠拢来缩短心理距离,寻求交流时对方的接纳。在跨文化交际和二语习得中,这种需要尤为明显。陈默的研究揭示,汉语二语学习者在口语交流中对母语者特征的趋同,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国文化参与者”和“内群体成员”这一身份认同的渴望[6]。相反,当个体的群体自尊受到威胁,或者是意图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时,“辨识动机”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进而触发趋异或维持策略的现象。此外,交际者的“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就是对某种语言变体在“社会地位”与“团结度”(Solidarity)这两个维度上的情感与价值评价,直接决定了其适应的方向。王玲发现外来移民对城市当地方言所蕴含的社会资本越认同,他们的方言趋同意愿就会变得越强烈[7]。

3.2. 社会结构层面

语言政策与各种规定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语言适应的基本方向。

从语言政策方面来看,国家推广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构成了更有力的外部推动。戴庆厦等明确指出[8],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功能变化时指出,少数民族成员在公共领域说普通话,去适应普通话,就是语言政策引导的结果。而学校教育中的教学的语言选择、媒体的语言使用、公共服务中的语言要求,都构成了制度化的适应压力。从空间的分布与人们的社交网络来看,居住隔离或社会资本网的形态直接决定了适应的成效。申慧淑对城市朝鲜族的研究指出,聚居的模式能够为族语的“维持策略”提供坚实的社区心理屏障[9],但如果一旦处于零星散居状态,汉族主流社区的交往压力便会倒逼个体迅速向汉语趋同。张瑞芳等对留学生的研究也同样证实,社交网络中本土核心成员的比例越高,适应效率就越好[10]。从社会经济地位与权力不对称的角度看[11],吴福祥在论述语言接触时强调,语言接触的方向和结果往往与接触双方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这一视角对于理解农民工向城市语言适应、少数民族向国家通用语言适应等现象很有帮助。在社会环境中,标准语通常与高经济资本、高文化资本捆绑,掌握它意味着能获取更多向上流动的通道,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弱势阶层向强势阶层语言靠拢的本质,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争夺。

3.3. 说话场合与说话对象的影响

场合的一种正式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首先是场合的正式程度, 就是说在正式场合中, 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 表现出向规范靠拢的适应; 在非正式场合, 语言使用则更为放松, 方言或亲密语体更容易出现。这种场合驱动适应往往是自动化的, 甚至不容易被说话者意识到。交际对象特征同样关键, 比如说是对方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地域背景、与自己的关系亲疏, 都会影响适应的选择。王玲发现移民面对本地居民时会更努力地使用当地方言或普通话, 面对同乡时则更可能保持家乡话。李雪梅、李姝婷在对《红楼梦》中称谓语的考察显示[12], 人物通过选择不同的称谓语来定位和调整与对方的权力关系和亲疏距离, 免得显得太生分或者太疏远, 这是言语适应理论在古典文学文本中的体现。

4. 中国语境下的语言适应实证研究

中国复杂而动态的语言社会生态为语言适应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深耕于以下四个现实场域。

4.1.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与随迁子女的语言适应

大规模的农民工及其子女从乡村流入城市, 这一类群体面临的首要文化障碍即是语言。武小军从“市民化”进程的角度讨论了关于流动人口的语言适应问题。他认为, 语言适应是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学会使用城市通行的语言, 不仅有助于获取就业信息, 获得一些生活上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能否被城市社会来接纳从而建立在所处城市的归属感。所以, 语言适应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的掌握, 更是流动人口跨越社会阶层、获取城市认同(如落户、市民待遇)的一种无形的门槛。随迁子女作为流动人口的第二代, 其语言适应存在独特的“双重压力”与教育公平问题[13]。方小兵关注随迁子女的语言适应的问题。这些孩子处于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在学校使用普通话, 在家里与父母说家乡话, 在社区可能接触当地方言[14]。进而得出语言适应能力较强的孩子更容易融入学校生活, 与本地同伴建立良好关系, 学业表现也更理想; 而语言适应困难的孩子则可能出现学习障碍、交往退缩和心理适应问题, 李琳在调查时也发现, 若儿童无法成功在普通话与当地方言之间实现工具性与情感性的平衡的话, 极易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双重边缘化”状态[15]。此外这些问题还关涉教育公平, 这些孩子进入城市学校时, 他们的语言背景跟本地孩子存在差异, 如果学校不能提供有效的语言支持, 他们可能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造成“学校(标准普通话)、家庭(家乡方言)、城市社区(地方强势方言)”的三重语言冲突。语言适应好的儿童能迅速建立跨群体的同伴关系, 而适应困难者则极易在学校遭遇隐性的排斥。

王玲对北京、南京、合肥三地外来移民的对比研究具有较强的方法论启发。她指出, 不同城市的语言生态景观差别很大: 北京作为普通话标准音所在地, 语言环境相对单一, 移民的适应目标主要就是普通话。而在南京、合肥这类拥有强势方言的省会城市, 移民需要同时应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 就是正式场合使用普通话, 而在日常社区生活中接触和使用当地方言, 适应过程更为复杂。而从城市居民对移民的语言态度也能够影响适应的策略, 在语言包容度较高的城市, 移民更愿意学习使用当地方言或普通话; 在语言排斥感较强的环境中, 移民可能就更愿意退回到他们同乡的圈子。

4.2. 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与适应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适应问题值得关注, 也具有价值和意义。

在现代化背景下, 少数民族由于流动到城市或受到大语种的辐射, 他们的语言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申慧淑对大都市散居朝鲜族的考察发现了深刻的代际断层: 第一代朝鲜族移民在家庭和族群内部较多使用朝鲜语, 在公共领域使用汉语, 呈现出来领域分离的适应模式, 就是说两种语言各司其职, 互不干

扰。年轻一代则在更多场合使用汉语, 朝鲜语使用域明显收缩, 但在特定场合中仍会使用, 这种分离式适应模式, 维持了双语的平衡; 而到了二代、三代, 由于母语习得环境的丧失和主流升学就业压力的加大, 族语使用域严重地向后退缩, 表现出深度的、甚至单向的汉语趋同。

更为深远的是, 个体的言语适应行为经过几代人的累积, 会直接影响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结构。戴庆厦与杨晓燕以四川省濒危语言贵琼语为例进行的语言接触研究表明, 在贵琼语与汉语长期的非对称接触中[16], 贵琼语的语音系统开始大面积丢失特有音位而向汉语靠拢, 词汇系统中基础词汇被汉语借词渗透, 语法结构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面对方言和族语濒危的现实, 周庆生基于中亚东干族的实证研究, 提出了很有理论价值的“语言适应-传承模式”[17]。东干族虽然长期处于俄语、吉尔吉斯语等强势大语种的合围之中, 且在公共政治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极高的向上适应度, 但他们通过在家庭内部坚持陕甘方言口语、宗教术语、在族群内部进行双语文学创作等, 成功实现了适应与传承的平衡, 也反驳了西方早期认为“适应必将走向同化”的定论。

4.3. 第二语言习得与国际中文教育中的语言适应

在跨文化交际和二语教学的领域, 言语适应理论被赋予了更多的应用价值。

张瑞芳等对来华蒙古国留学生的历时考察表明, 跨文化适应并非一蹴而就, 表层的障碍在于语音、语法等语言本体层面的困难, 深层障碍则在于由于文化冲突导致的“语用不适应”, 例如对汉语中含蓄的拒绝、复杂的礼貌原则、幽默方式的误解。留学生能否建立包含本土导师、中国朋友在内的社交网络, 是决定他们能否顺利从学习场合的临时适应到真正融入的重要因素。陈默的研究则打通了社会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边界。通过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发展过程的追踪研究, 证实了“认同构建-言语适应-口语流利度提升”的螺旋循环过程, 也就是说学习者为了获得本地朋友圈的接纳, 会有意识地模仿中国人的语调、高频词及流行用语, 这种做法能够加速口语自动化提取, 直接提升了口语流利度。李宏强则讨论了该理论对教学法的启发, 批判了传统外语口语教学一味追求语法正确的弊端, 主张引入言语适应的视角, 培养学生根据听话者特征调节话语语体的“交际灵活”[18]。

4.4. 语言适应理论在文学文本解读与网络虚拟社群言语分析中的运用

除了上述传统领域, 国内学者还展现了将该理论在文学文本阐释上的创新尝试。在文学语用学领域, 李雪梅等对《红楼梦》的研究证明, 言语适应理论可以成为剖析古典小说人际权力细节关系的得力工具。在数字传播领域, 谈宏慧对英汉年度热词的传播进行了言语适应论的创新阐释。她敏锐地指出, 互联网并非语言的荒漠, 网络热词如“情绪价值”“City不City啊”的创生、扩散与消亡, 本质上是网民在网络虚拟社区中, 大量网民去跟风使用, 形成流行的浪潮。

5. 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尽管国内语言适应的研究在实证层面取得了进步, 但用比较严苛的学术标准来审视的话, 当前国内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 下文在逐一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提出相应的研究展望。

5.1. 理论深度的依赖与本土化构建基础的不稳固

纵观国内三十年来的学术产出, 大部分文章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缺乏对西方理论假设的批判性眼光, 像贾尔斯的言语适应理论就只植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低语境(Low-context)的交际以及相对来说扁平的群体关系。然而, 在中国社会, 这样一个典型的高语境、强调面子、讲究差序格局与人情关系的社会, 多数研究直接将趋同、趋异概念套用到中国的数据上, 所以未能深刻挖掘中国独特的特性。其次还有核心概念缺乏原创性的推进, 除了周庆生的“适应与传承模式”外, 国内鲜少有学者能基

于中国的人口流动和多民族语言接触事实, 提炼出具有普遍理论普适性的新概念、新模型, 在国际顶尖社会语言学期刊上的学术可见度与话语权也严重不足。

未来研究应当有意识地走出西方理论的限制, 结合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 考察在讲究熟人社会、权力距离显著的中国社会结构中, 语言适应如何作为一种维系关系的方式来运作。通过挖掘中国独特的社会流动样本, 可以提炼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概念, 推动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理论自主性发展。

5.2. 研究视角的失衡与拓展方向

现有研究在视角分布上存在三重失衡。其一, 重“趋同”而轻“趋异”与“维持”。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及社会主流话语强调“融合”“顺应”的隐性影响, 国内学者对通过“趋同”实现社会融入的研究用力颇多, 而对表达群体抗拒、文化傲慢、社会隔离的“趋异”和“维持”行为关注甚少。事实上, 城市原住民面对外来移民时故意操持本地方言以割清界限的“言语趋异”, 或弱势群体遭遇语言歧视时采取的消极“维持策略”, 其背后的阶层划分与边界维系往往比趋同行为更具社会语言学的诊断价值。其二, 重“微观心理”而轻“宏观结构”。多数实证研究过度沉溺于心理还原论, 将个体的言语适应行为简单归因于个人对目标语的态度, 而忽略了国家语言政策、城乡二元结构、居住隔离、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削弱了言语适应理论本应具备的社会学批判力。其三, 数字新媒体语域存在显著的研究缺口。当前研究主要聚焦线下实体社区, 而对社交媒体(微信、小红书、抖音)、弹幕文化、人机交互等线上场景中, 人类如何调整数字多模态话语以适应算法逻辑和虚拟社群规范, 缺乏及时和成体系的理论回应。

回应上述的失衡, 未来的研究应首先将“趋异”与“维持”提升至与“趋同”同等的理论地位, 将其作为透视社会结构张力与群体边界维系的重要窗口; 其次, 强化宏观结构分析, 将个体语言选择置于语言政策、空间区隔与资源分配的交织框架中加以审视; 再次, 将视野从物理社区拓展至数字空间, 深入考察网络直播、短视频平台、虚拟社群中的多模态符号适应性调整, 以及人机交互中人类为适应机器理解逻辑而主动调整话语风格、机器又通过高仿真言语趋同获取人类情感信任的新兴适应形态。

5.3. 适应与顺应的理论混淆与方法论革新

在梳理国内文献时, 我们发现学界对“语用顺应”与“言语适应”这两个理论容易混淆, 即部分国内学者在讨论“语言适应”时, 经常将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用顺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与贾尔斯的“言语适应理论(Accommodation Theory)”混为一谈。笔者在查阅相关理论后发现这两个理论在理论基础、分析和重点关注上完全不同。维索尔伦的“顺应”探讨的是人类语言全方位的认知适应本质, 而贾尔斯的“适应”探讨的是人际互动的社会心理修辞。

未来研究应当首先从概念上做出清晰区分, 避免术语混用造成的理论边界模糊。在此基础上, 必须打破传统社会语言学田野调查与经验主义文本分析的单一范式, 通过组建跨学科团队, 将语言适应理论与认知神经语用学、社会学等结合起来, 引入眼动追踪、脑电实验、语料库计算等新兴研究方法, 以多元方法提升研究的解释力与科学性。

5.4. 从学术研究到公共治理的转化

当前国内语言适应研究长期局限于学术圈层内部, 研究成果向公共政策与教育实践的转化明显不足。未来的应用研究应当对接国家“城市现代化治理”与“教育公平”的需求。例如, 通过量化研究探讨流动儿童的语言适应瓶颈, 为城市中小学开发相应的以地方语言文化融入为主要内容的“校本教材”; 或基于少数民族语言适应的实证数据, 为双语教育政策提供针对性建议, 使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社会语言

生活的现实需求。

在方法论上, 应组建长期跟踪团队, 对进城务工人员家庭、跨国婚恋家庭、散居少数民族家庭进行持续观察, 系统考察父辈的语言自卑与适应经历是如何通过家庭语言规划来影响到子辈的语言习得, 透视家庭内部由于言语转用引发的代际隔阂与身份认同分层, 让研究真正嵌入到生活里。

6. 结语

言语适应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以来, 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多年, 已从最初关注语音调整的心理假说, 变成关注人类社会的互动、人类群体认同的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而且已经频繁出现在跨学科中。中国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该理论以来, 紧扣时代脉搏, 在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大潮、少数民族语言变迁、国际中文教育等重要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语言生活现实的认知。

然而, 在今天这个强调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年代, 国内的语言适应研究应当展现出更高的学术自觉。未来的研究要减少对西方理论的盲目依附, 勇于开拓数字语域与代际追踪等, 通过方法论的跨学科革新, 在深刻解构中国复杂社会现实的同时, 积极向国际学术界输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原创性学术话语。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布朗语濒危方言景谷芒旺话调查记录与研究”(21XJA74000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交融视域下佤德昂语支语言接触中的语法演变研究”(YB20266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刘正光. 言语适应理论研究述评[J]. 语言文字应用, 2001(2): 57-64.
- [2] 姜晖, 王强.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下的语言发展观[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21(1): 18-21.
- [3] 王士元. 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5-13.
- [4] 罗迪江. 语言适应论的生成观[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22(3): 34-37.
- [5] 兰晶, 罗迪江. 语言适应论框架下解释范式的后现代趋向[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1(2): 93-96+119.
- [6] 陈默. 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认同构建、言语适应和口语发展的关系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2(1): 26-37.
- [7] 王玲. 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1): 75-84.
- [8] 戴庆厦, 邓佑玲. 城市化: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71-75.
- [9] 申慧淑. 城市朝鲜族语言适应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 [10] 张瑞芳, 杨伊生. 来华蒙古国留学生跨文化语言适应研究[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28(9): 82-85.
- [11] 吴福祥. 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J]. 民族语文, 2007(2): 3-23.
- [12] 李雪梅, 李姝婷. 言语适应理论下称谓语与社会距离关联性——以《红楼梦》为例[J]. 青年文学家, 2014(2): 119+121.
- [13] 武小军. 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5): 91-99.
- [14] 方小兵.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的语言适应与语言认同[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7(6): 138-144.
- [15] 李琳. 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的语言适应——以关中方言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12(2): 151-154.

- [16] 戴庆厦, 杨晓燕. 语言适应与语言发展——以贵琼语的变化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3): 50-57.
- [17] 周庆生. 语言适应-传承模式: 以东干族为例[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4): 10-18.
- [18] 李宏强. 言语适应论在外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探讨(英文) [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0(10): 169-172.